

watch| 上证观察家

股市“复位”是优化金融结构时间之窗

□张平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经济对于金融业的需要将更加强烈。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金,跨出了贫困陷阱,2006年预计中国人均GDP可达到2000美金,中国已进入了加速的结构变革期,在普遍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急需建立更加新型的金融体系。

后发国家最为稀缺的是资金,资金是配置资源的核心,政府通过特殊的金融结构进行资源的配置。过去在政府干预下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和配置体系。这种银行为主导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银行一直起着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银行是“全能”的金融机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企业资本是靠“拨款”,改革后进行了“拨改贷”的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从财政转向到国有银行,但很多资金在人们的眼里还是认为贷款就是拨款,国家设立企业时的资金来源来自贷款。国家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进行贷款,银行坏账大部分只能视为国家为发展进行的“透支”或“补贴”。

银行在这种干预条件下对中国的大量企业进行贷款,这些大多为制造业的企业都是没有资本金或资本金较低的,贷款都是长期限的贷款,没有担保,没有抵

一方面 15 万亿元庞大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实体急需股权资本又难以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融资,国外资金成为股权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金融结构和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结构失衡导致中国福利损失。但目前这种资金供给和实体需求的不匹配虽然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低估,但也因此正好造就了国际和国内进行股权投资资金“套利”的大好时机。

押,与资本金相仿。中国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但却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没有银行的这种“补贴”,中国的乡镇工业、民营和国企都是难以快速发展起来的。

银行体系在1992年后又快速发展为全能银行,有了证券、信托等功能。直到1994年宏观调控后,银行体系开始了最严厉的调整,才开始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手段向着现代商业银行转变。

1997年底,国家开设了消费信贷,结束了银行只能搞企业建设贷款的历史,为银行创造了转型和发展的机会。银行在贷款时开始要求“资产抵押”这一基本商业运作手法,消费信贷和城市基本建设等与城市化相关的贷款在大中城市银行的中长期贷量到2003年占到近80%,在全国整个银行业中占到40%,中间业务发展加快,这都优化了银行的贷款和业务结构。

2005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相继上市,逐步切断了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彻底商业化了,但它们

在总体上的金融结构仍然没有变,即金融资源仍在银行手中,15万亿元存款靠商业银行来配置。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全球的加工中心,其特征表现在:第一,过剩的产能和加工能力完全能满足全球的需求,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产能都过剩;第二,引进和模仿性技术大行其道,技术来源主要靠引进设备或技术模仿,技术水平也限于加工等级,改进也仅在工艺、应用功能设计等方面,而技术创新方面的水平不高;第三,竞争模式表现为低成本“套利”式,一个公司发展出一种产品能在市场获利,其他企业马上通过引进设备或模仿快速进入该领域进行“套利”。而套利的模式主要靠低成本,竞争盈利的门槛在成本,而不在技术,一代产品竞争完了,等待下次机会。有人形象地将这种状况比喻为“吹响经济”,有机会就吹响集合起企业生产,没机会吹响解散。

制造业发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建设产能的钱了,但由于拼成天,没机会吹响解散。

制造业发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建设产能的钱了,但由于拼成天,没机会吹响解散。

败伤伤的产品竞争中死去。残酷的竞争已经使企业没有余力进行技术创新了,企业经常处在亏损的边缘,按资产定价原则衡量公司的资产价格非常低,是通过资产重组并购的大好时机。

重组并购需要的是股权投资,而不是贷款。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要素价格重估,环保、社保等管制加强,税收严格化都会引致制造业的竞争更为残酷,领头的企业都很无助了,需要产业整合。

新型服务业或高科技快速发展,资本金需求也处于饥渴,如我们熟悉的银行业、证券、保险、房地产、互联网、生物技术和物流等都是如此,需求巨大但缺少资金,而需要的资金也是股权投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中国经济增长原来是一个靠银行贷款完成初始资本发展的系统,资本金充足一直是问题,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型服务业或技术创新,企业更需要的都是股权,但银行不能再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了,其

他的金融机构同样供给不足。因此,一方面15万亿元庞大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实体急需股权资本又难以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融资,国外资金成为股权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金融结构和发展需求的不匹配,更明显地表现为储蓄增长过快,而投资还没有充分利用好,导致所谓“全球金融失衡”,中国输出的资金被人转换为股权投资,返回来套中国资产的利,中国金融结构失衡导致中国福利损失。

由于政府扭曲了资源要素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供给结构的同质性很强,产能迅速扩张。企业在政府干预的激励下更注重“套利”式的低成本扩张,而不善于进行自主创新和新领域开拓。每年政府都要提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效果都不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这种微观激励造成的。

不过,目前这种资金供给和实体需求的不匹配虽然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低估,但也因此正好造就了国际和国内进行股权投资资金“套利”的大好时机。这样做,既可以获得资产低估的好处,也可以获得因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未来资产溢价的利益,这就是资金的逻辑。中国资本市场经过股改“复位”,恢复了资本市场的功能,借此机会加快调整金融结构正是时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Blog

“还没有性生活的鸡”是道什么菜

□王平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餐饮业菜单英文译法》已经完成讨论稿,明年将出台标准,届时北京市餐饮饭店中的数千种菜,酒,都将有统一规范的“英文名”。目前公开的讨论稿是按照菜的原料、做法翻译的,比方说宫保鸡丁,翻译完了就是“花生、辣椒、葱炒鸡肉”;过桥米线成了“加鸡肉的鸡汤粉丝”。

中国人善解人意,出国之前,常会多方了解西方的习惯、常识,外国人到来,也要千方百计地给他们营造一个如身在家的环境。于是,我们的菜名也开始西化,在这一西化过程中笑话迭出。据《半岛都市报》报道,近年来,由于到青岛的外国游客增多,一些酒店对菜单进行了翻译,以方便外国客人,结果,把“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狮子头”,活生生把老外吓跑。“麻婆豆腐”翻译成了“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莫说去吃,听听都让人觉得恶心。

“童子鸡”则被翻译成了“还没有性生活的鸡”。外国人喜欢较真:你怎么知道这鸡没有过性生活?鸡有没有性生活对菜味道有什么影响?这种问题真的会让人喷饭。由此,不禁让人想到福娃的翻译。福娃是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如果放在其他国家,一般都会用本民族的读音作为翻译,然而,我们有些人偏想着为老外着想,怕人家弄不明白,就给翻译成了“Friendlies”,但是在,发音上,“Friendlies”跟“Friendless”(没有朋友的)发音雷同,容易造成误解。

无奈之余,北京奥组委对“福娃”的国际译名“Friendlies”作出正式更改,新的英文译名为汉语拼音“Fuwa”。“Fuwa”既简单明了,又有民族特色,还让外国人轻易就学会了两个中国汉字的读音,可谓一举多得,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种翻译呢?

透过一个翻译的细节,不难看出我们在文化方面的不自信倾向。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文化的重建却滞后于经济发展,外来文化的涌入使我们有些迷失。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研究的美国旧金山《硅谷时报》副社长诺曼就认为,现在中国人太在乎西方人的看法,特别是美国人的看法。这种善意提醒值得我们反思。

民族的才是有特色的,有特色的才具有吸引力。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看到的更多是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呵护,这源于一种自信,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自信。

水污染将成为城市终结者?

□吕翔

12月26日,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说,水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V类水质,基本丧失使用功能。重点流域40%以上的断面水质没有达到治理规划的要求。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近岸海域赤潮和三峡库区支流“水华”现象接连发生。

水是城市的灵魂。世界最初的城市基本上都出现在四大河川,即黄河流域、幼发拉底河流域、底格里斯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相应的,当水枯竭的时候,城市也会终结。像“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城、印度西北部的斯育古城等等,都是由于水枯竭而突然消失的。而今天的水污染,同样在带来与水枯竭相类似的危险。

据周生贤介绍,全国大、中城市浅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城镇周围区,以及排污河道两侧,引污灌区污染尤为严重。全国不少地区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水源地区呈缩减趋势。据调查,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当大城市中心地带和周围的水源出现大面积污染,城市还将如何维系?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本来就干

旱缺水。淡水资源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截至2005年初,中国的660多个城市中,一半以上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11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就达到2000多亿元。

在淡水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污染可谓雪上加霜。而且,地下水一旦污染,无论从资金投入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得到治理的可能性都近乎为零。日本经济虽然非常发达,但对于治理地下水污染所需经费的高达10兆日元以上的投入,也只能扼腕叹息,无可奈何。

除了污染,还有对水的无

节制开发和浪费。仅黄河流域,就有16个大中城市实施“拦河造湖”、“挖湖引水”计划。其中郑州、洛阳、西安、咸阳、宝鸡、石嘴山、太原已形成或计划形成的人工景观水面达56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仅郑州、西安、咸阳,计划投入的相关“蓄水资金”就达40多亿元。在黄河一些河段出现断流的情况下,这种“蓄水运动”无异在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经过几年前的发展,城市已经高度现代化,但是,缺水和水污染,将成为制约大城市发展乃至生存的瓶颈,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继续默认水污染和浪费情况的发生,水可能成为城市的终结者,楼兰古城的悲剧或将重演。

通货膨胀有悄然加速征兆

□邓聿文

由于受部门利益的影响,现在多数公共产品垄断行业,对改革本身并不很感兴趣,但是对于利用提价来获取利润的积极性很高,所以每一次改革,都变成了一轮新的提价。2007年中国的CPI指数将有一个逐步加速乃至跳跃增长的阶段,甚至通货膨胀极可能借助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以一种不经意的悄然到来。

□邓聿文

前些天给老家打电话,我那80多岁的老母向我抱怨,现在什么都涨价了,肉涨到8块多钱一斤,吃不起了。老母朴素的感觉跟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就全国来看,11月份CPI较上年同期增长1.9%,增幅跃至年内最高,也是自去年3月以来再度逼近2%,增幅较10月份的1.4%明显反弹。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3.7%,其中粮食价格涨幅达4.7%。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7.6%。同时,央行公布的商品价格指数(CGPI)也出现强劲反弹,11月份CGPI同比涨幅达到4.1%,增幅也创下年内新高。

中国几大城市高达一至二成的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决非偶然,是近年来不断高涨的房价和公用事业价格催生的结果。房价早已背离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地产泡沫将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因为

房地产是一个关联度非常高的行业,地产泡沫肯定会引发投资热。事实上,这两年的投资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房地产带动的。但年初在预测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的却是中国经济会陷入通货紧缩当中,当时最乐观的预计也就是GDP年增长9%,原因就是多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现在到了年底,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同比有所降低,但仍然高达24%,其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全年GDP增速更是达到9.5%,为近10年的最高,物价涨幅也不是年初预计的1%稍多一点,而是超过了1.5%,并且愈到年底,涨幅愈高。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掌握了公用行业产品的定价权,这些行业和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形成市场定价机制。鉴于公用产品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政府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可能使国有垄断企业借机通过提价向全民勒索。这在以往油、气、电的多次涨价中已露端倪。由于受部门利益的驱动,现在多数公共产品垄断行业,对改革本身并不很感兴趣,但是对于提价,对于利用提价来获取利润的积极性很高,所以每一次只要讲改革,就以成本增加,企业亏损为由,向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政府对企业的成本又不很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每次价格改革,都变成了一轮新的提价。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缺乏,也就使得中国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至今仍不完善。这就对物价上就有明显的表现。如前所述,2006年生产原材料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价格大幅增长,尤其以有色金属和能源为巨。而去年底,CPI指数涨幅还不到2%,虽然创下今年的新高。其原因便是中间环节被阻隔以致下游产品价格尚未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波及。主要表现在水、电、气等的价格仍被实行着垄断定价,无法随之提升。然而这种阻隔直接影响着国有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效益,长此下去企业必将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要求提价。事实上,垄断价格正在逐渐放开,如成品油价的上

调,说是受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但在油价下跌之后也未见其下调。如今,粮油价格的上涨,肯定会影响水、电、气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产品价格二连三地上涨。一旦影响国计民生的中间产品的垄断价格被上调,其向下游再传导的速度将可能更快得多。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中发生,因为自2005年以来,已有多个城市表示要提高这类产品的价格。换言之,2007年中国的CPI指数将有一个逐步加速乃至跳跃增长的阶段,甚至通货膨胀极可能借助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以一种不经意的悄然到来。

总之,此番柴米油盐、水电油气轮番涨价,能否最终带来通货膨胀以及通胀的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但从上面的分析以及今年中国房地产和股市的走势来看,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涨幅进一步加剧,人们的购买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也就将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也将进一步过剩,最后,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很多人因此失业。届时,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平。所以,央行重提稳定物价,为预防通胀的发生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voice| 上证名记者

谁阻碍了药品降价

□时寒冰

临近新年,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正在加紧准备第21次药品调价工作。然而,这种消息对公众而言,已经近乎“降价疲劳”,难以激起快感。因为此前的20次药品降价,并未取得良好效果,有些药品还越降越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看病难、看病贵”被民众排在第一位就是最好的注脚。

药品降价为什么降不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药品降价并非一个独立的过程,这与我国医药管理格局的分配有关。根据职能划分,发改委负责药价的调控,卫生部分管医院,药监局分管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这种权力分配本身就决定了,药品降价需要三个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但是,在药品降价过程中,始终是发改委唱独角戏,三个部门之间不仅未能密切协作,部门利益的身影也时常浮现出来。

从根源上来看,药品降价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与政府未能承担相应责任密切相关。发改委所主导的药品降价,是一种成本转嫁过程,即由药品生产厂家承担几乎全部降价成本,如果生产厂家无力或不愿承担成本,就会停止被列入降价目录的药品生产,或者跑到药监部门去“美容”变成新药。而同样实施药品降价政策的日本,则由医疗保险公司补偿药品费用,政府、医疗保险公司与药品生产企业一起分担降价的成本,确保药品降价取得实效。

因而,要使药品降价取得效果,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由药品生产厂家来承担全部降价。

药品降价的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不顾效果只顾埋头降价,乃是本末倒置。

突击调整干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刘道伟 制图

□冯玉国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因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被撤职。高东辉于2001年6月任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今年3月27日,他在离职前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提拔和调整了283名干部。

类似这种事情已经屡屡发生: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在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山西省长治县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原山西省忻州地委书记刘增宝、行署专员李英明在将调任前,突击调进265人;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年底将要调离响水县时,仅用2个小时就研究变动了102名科级干部……

这说明,突击调整干部并非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正因为这一点,更值得我们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因素。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是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个人利益或效用由一系列目标诸如权力、财富、地位或声望等组成,在众多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人会本能地根据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作出最佳选择。

同样,在官员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他必然要经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作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官员(主要是一把手)突击调整干部所面临的收益包括:收受贿赂,牟取私利;提拔亲信尤其亲属,构成权力腐败链条或家族权力网络,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长久的时间内获取私利。而他可能面临

制止,这难道不蹊跷吗?再说发改委。发改委作为降价的主导者,在降价之初,它被民众寄予了厚望,然而,它似乎一直在埋头于降价,而对降价效果未能作出准确的评估。换句话说,发改委似乎更关心药品降价本身而非降价效果。

事实上,发改委无疑是连续20次药品降价的最大赢家,2000年以前,纳入政府定价的品种只是少数临床应用较多的常用药品,约200种。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降价,发改委不断修订政府制定价格的药品目录。修订后的新目录品种数量,由原来的1500种左右扩大至2400种左右,约占药品总数量的20%,但市场份额则高达60%。

通过降价,发改委不动声色地实现了权力的扩张。可以说,降价让三个互不协调的部门,或多或少都有所收益,这正是药品降价有时越降越高的原因之一。

因此,要使药品降价取得效果,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由药品生产厂家来承担全部降价。

药品降价的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不顾效果只顾埋头降价,乃是本末倒置。

的成本则包括:因受到监督和制约,突击提拔未遂;因受断提拔干部披露,遭到问责。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选拔干部的民主环境尚未形成,突击调整干部很容易得逞。同时,由于监督体系不完善,相关干部的这种做法存在着不被上级发现的可能性。即使突击提拔干部败露,官员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也多为行政方面的,遭到法律问责的几率依然不高。相比之下,所有的利益都是唾手可得的,既然成本不高,风险不大,而收益非常现实和丰厚,一些官员自然会倾向于这样做。

因而,“一把手”突击调整干部屡屡发生,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瑕疵。近年来,由于监督缺位,“一把手”的权力急剧膨胀,其犯罪的几率也越来越高。1999年“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大案比例是51.8%,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5.1%。但是,每当有“一把手”落网,人们更多的是从贪官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角度来反省问题,而忽略了制度设计这一根本因素。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无业游民时国祺,雇用他人假冒县委书记的签名,不仅把自己和妻子“安排”进了审计局和劳动局,还收取他人3万到8万不等的钱财,将30余人安排至党政机关。因为在众多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人会本能地根据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作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官员(主要是一把手)突击调整干部所面临的收益包括:收受贿赂,牟取私利;提拔亲信尤其亲属,构成权力腐败链条或家族权力网络,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长久的时间内获取私利。而他可能面临

的现实是人的本性。当不断有干部通过突击调整干部牟取私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干部任用制度设计、民主程序设计、权力监督设计等方面查找原因,及时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正。